



王小慧

我的视觉日记

旅德生活二十年 青春版

东方出版中心



王小慧

我的视觉日记

旅德生活二十年 青春版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视觉日记：旅德生活二十年：青春版 / 王小慧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8

ISBN 978 - 7 - 5473 - 0045 - 9

I. 我… II. 王… III. 王小慧—自传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0087 号

责任编辑：余佐赞 旭 子

封面设计：陈妮娜

版式设计：童郁喜

我的视觉日记：旅德生活二十年 青春版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锦佳装潢印刷发展公司

开 本：700×1 000 毫米 1/16

字 数：283 千字

印 张：17 插页 4

版 次：200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3 - 0045 - 9

定 价：3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1	“青春版”白序
3	引子
5	我们可以飞了
15	路伸向何方
25	燃尽的蓝蜡烛
41	走过我自己
49	我的二十四小时
61	远处的光
81	重返布拉格
94	莎乐美舞
109	破碎的月亮

124	万里魂牵
135	我的孩子梦
149	推迟七年的书
161	关于死亡的联想
172	从眼睛到眼睛
186	理想主义傻瓜
193	抓住感觉
210	再生繁花
223	“9. 11”改变了我的选择
233	两个世界之间
248	三个故乡
266	附录：贝歇尔致王小慧信

“青春版”自序

出“青春版”的动议来自一位贝塔斯曼的朋友。她认为《我的视觉日记——旅德生活十五年》虽然非常畅销,但这本书太厚,订价太贵,还是影响了书的普及。假如能出一本通俗的讲故事的读本,一定会有更广泛读者。特别是因为我的读者大都比较年轻,包括很多白领和大学生。

的确,在我遇到的读者中,有很多是年轻人。本以为女孩子更多,但也会碰到男孩子告诉我如何喜欢我的书,甚至他们把我的书当成一本常常要翻阅的案头书,尤其在他们遇到情感或是工作方面的挫折时。

其实,很早我也接到过大学生读者的来信,说他们很喜欢我的书,但因为书太贵,买了一本回去大家传阅,因有的同学等不及,他们甚至在宿舍里由一个人朗读给大家听。这类的信总令我很感动。

我想,我的前半生遭受过太多磨难,好不容易从那些痛苦中挣脱出来没有被压垮,重新找到自己,慢慢从阴影里走出来,走到阳光中。那曾经是一条漫长曲折的路,我庆幸自己还能走到今天,还能以微笑面对世界。假如我的经历与感悟可以对我的读者有所帮助有所借鉴的话,那将是我最大的欣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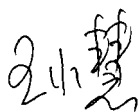
于是,我答应贝塔斯曼的朋友出一本“青春版”,加上我近五年的生活经历与感悟。

没想到这事一搁就是几年。因为我太忙,因为有太多更紧要的事情把这件事往后推了又推。我是艺术家,总是把艺术创作放第一位,写作仅仅是我的“第二职业”,更确切讲是我的“业余爱好”。因此,我的许多重要的写作计划都是一拖再拖,包括我与周国平先生合作的一本关于艺术与哲学的书也已经拖了三四年了,我简直无颜见周国平先生。

现在我终于把“青春版”赶出来了,贝塔斯曼却已物是人非。但我还是感谢贝塔斯曼促使我完成这本书。贝塔斯曼离开了,我的青年读者还在,而书的生命在于读者。

我的书出版七年,已经出了五种版本,其中一个台湾繁体字版、一个德文版、三个简体字版(平装本,精装本和珍藏本)累计重印三十余次。这次上海和台湾又要同时推出“青春版”,我希望青年读者能喜欢。

太多关心我的朋友想了解我的近况,他们写信给我,我总是没时间回信。我想这本“旅德生活二十年”中新写的三章就算是写给他们的一封长信。谢谢他们对我的关心。



2009年6月15日

引 子

已经是深夜三点钟了。我静静地躺在床上,没有开灯,天上也没有月亮。夜沉寂得能让人听到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声。清冷的街灯透过方格型的磨砂玻璃窗射进屋来,在墙上显出清晰的格子图案。偶尔驶过的汽车强光使图案轻轻移动,有时漫射到天花板上,令人感到迷离而怅惘……

几天来因病不得不躺在床上,翻看了出国以来的几十本日记,重温这些年所经历过的复杂而曲折的心路历程,回忆就像这映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的斑驳光影,时而明晰,时而模糊,混杂交错,重重叠叠。许多往事还是那么铭心刻骨,时至今日仍有切肤之痛,很难设想我还能再经受第二遍。

重读这些日记,又重读了一个最最真实的我。写下这一切原本只是为了自己,为了记录自己的生命,记下那些值得回忆的东西。被我称为“视觉日记”的那些照片,与文字一起更加形象和完整地记录了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悟。

我有意识地拍摄“视觉日记”是从1991年为准备摄影展《我的二十四小时》开始的。在那之前我也拍,但拍得过于随意,毫无目的。从那以后,拍摄生活中点点滴滴能触动我某一根敏感神经的或大或小的景与物,好像已成为一种习惯,成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有这些照片我无法想象能记清那么多发生过的事情,乃至很多细节。它们使记忆不再流失,就像一盘散乱的珠子被一根丝线串到一起。

毕加索曾经说过:“我作画就像有些人写自传。画,无论完成与否,都是我日记的一页,也只有在这意义下,它们才有价值。”我想,我的“视觉日记”也有这种特质,它们只有在连贯的整体观照之中才有意义。

它们既是我的情感日记,也是我的思想日记;通过文字我可以更细致地梳理思路,而通过照相机则能更用心地看世界并体验人生。有了它们,我的生命线索就会延续。它们记下的也许只是对我个人有意义的东西,它们已与我无法分离。

假如上帝只允许我带走两样东西的话,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这两样东西是日记本和照相机。”

我们可以飞了

飞机在跑道上加速时，地面的摩擦力非常之大，要有足够的能量来克服这些阻力。一旦离开地面，空气的阻力与摩擦力相比微不足道，飞机就可以自由飞翔了。最难的是在起飞之前那一段。

1986.10.30

没有鲜花，没有婚纱，没有戒指，没有仪式，没有宾客和喜宴，也没有朋友的祝愿，因为并没有人知道，也不能让人知道。只有一张印刷粗糙而俗气的结婚证书，大红的底色上印着金色的双喜，里面有我和俞霖的照片。那是两张年轻而稚气的脸，看上去像兄妹，笑得甜美。这是我对一生中唯一“大喜日子”的所有记忆。

那是 1986 年的 9 月 29 日，去德国留学的前夜。

在 1980 年代初，出国的机会比现在要少许多，尤其是取得公费奖学金，更是难上加难。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建筑学系的两个班级，各抽出一名学生去进修德语，准备一年后选拔出一名学生派往维也纳艺术学院学习。当时我和另外一个班的名叫俞霖的学生被选出，这样我和他便偶然地碰到一起。

俞霖是被当时的系主任称为“不可多遇的”、“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后来学院的院长也说过“像他这样的人才，七八年才会出一个”。他的设计作业和画作总是挂在系走廊的陈列橱窗里当作范例供人参观，自然他的名字在同学中也颇有几分名气。我印象中的他个子瘦瘦高高的，有一张孩子气的脸，总是笑咪咪的，举手投足之间不时透出一股灵气，好像话并不多。

遇到学习中有难题的时候，许多同学愿意去找他，据说他和善谦虚、乐于助人。有些设计图经他一改分数就会高出许多。



当年的研究生是很稀罕的，女研究生更是寥寥无几。记得“七七级”考研整个建筑学专业好像只有两个名额。戴着同济大学红色校徽在外面走，常会招人多看上几眼。大概这小小的虚荣使我显得如照片上那样志得意满。

直到开始去学习德语时，我们才正式认识。学习了几个月后，没人解释原因，那个留学名额分给了外语系的学生。

由于我们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恢复高考的“七七级”学生，和后面的“七八级”相差只有半年，而德语学习整整耽误了一年时间，我们很想抓紧补习以便跟上“七八级”课程以及研究生考试，因此像散兵打游击一样，同时在两个年级听课、补习，进进出出几乎形影不离。

那时比较熟悉的老班级同学喜欢和我们开些善意的玩笑，说我们是一对“金童玉女”，我们自己却傻傻乎乎的，为完成一个个考试而疲于奔命。那年没有去成维也纳，反而成全了我和俞霖的缘分。我们在一起学习那么愉快，那么开心。

为了补上这半年缺少的课程，我不得不忍痛放弃许多业余爱好，像看电影、读小说、缝衣服，以及刚刚开始允许跳的交际舞。只有假期的旅行和学生摄影协会的活动，我不愿放弃，因为太喜欢摄影了，几乎到了着迷的地步。那时会在假期拍许多照片，然后整夜在暗房里冲印、放大照片，没有专业书籍和指导教师，浪费了许多胶卷、相纸。不过假如没有这些浪费，也许不会有今天。

在那几年中，我们有过三次机会去德国留学，其中有两次是俞霖到德国后读博士的第一导师贝歇尔（Max Baecher）和第二导师史密特（Peter Schmidt-Thomson）邀请的，当时他们在同济大学做客座教授，作几个月的短期讲学，我俩不光听课，也担任翻译及陪同，所以与他们交了朋友。贝歇尔教授当时问过我名字中文的意思，此后，他们夫妇亲昵地把我称做“小精灵”。他来讲学时曾把德国一项他主持过的建筑设计竞赛拿来当练习题让我们做，学生们挖空心思

在这块空地上造一个漂亮的公共建筑,设想五花八门。我当时什么建筑也没考虑,而是将它搞成一个有绿化、水及雕塑的公园,他为此想法叫好,因为没人想到。他说可惜投标早已过去。他还是给了我很高的分数,而且还把这设计方案拿到德国专业杂志上发表,并把我的设计图带回德国,多年来一直挂在他的教研室里。

他们的好意邀请被我们婉言谢绝,因为我们,特别是俞霖不想太麻烦朋友,还想靠自己的努力考公费奖学金。

还有一次是我的好友格尔达(Gerda Cordes)女士邀请的,她是我当时在上海的好友,她在华东师范大学里教了两年德语,很想学习普通话,我也很高兴有机会练习德语。在那几年中,我们常常周末见面,一起看展览或看电影,然后去和平饭店的咖啡厅坐坐,那时的上海咖啡馆寥寥无几,大部分宾馆则要有外国人一起时才可随便进出。她也知道我和俞霖一直在等出国机会,有一天,她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她与作为建筑师的父亲商量,准备邀请我们俩去德国读书,由她来做经济保证。我们虽然很高兴她能这样主动与诚恳,而且也盼望快一点出国,但仍想等待公费奖学金,而且相信,以我们俩的成绩只要有留德名额是非我们莫属的。我和格尔达的友谊至今已有二十几年,她常常把这件事讲给其他朋友听。她说在中国教过那么多学生,很多人都曾经请求过她帮助出国,她没有能力帮助那么多人,但主动提出帮助我们,却遭到拒绝。虽然我们的拒绝使她深感意外,但也使她感到我们之间的友谊非常纯洁,没有利益等因素掺杂其中。

终于在1986年等到了公费出国的机会,这与1980年维也纳艺术学院的奖学金机会相差了整整六年。俞霖已是我们当时系主任、中国建筑界元老冯纪忠教授的助手,我则刚刚读完研究生毕业留校。这两个奖学金来之不易。我们天天盼望能早日成行,生怕夜长梦多。

我们有意将婚期拖到不能再拖,直到一切稳妥,不仅通过了各种审查考试,护照拿到手,签证也已取得,机票是9月30日下午的。29日下午匆匆去结



到上海读书远离天津的家,也远离了心爱的钢琴。这架新钢琴是父亲送的结婚礼物,可惜它无法伴我左右,随我远渡重洋。



出国前俞霖为我拍的照片

婚登记处领了证书，没能来得及与家人吃顿晚宴庆祝一下便又继续去整理行装。那么多想要带的东西全要精减到二十公斤的箱子里，多少心爱的东西不能带走。那一夜我们虽然很累，心情却非常愉快，等待了六年的机会终于到来。当时并不知道这一走会改变我整个一生，但无疑这是我有生以来最重要的也是最远的一次旅行。

第二天上午，传呼电话亭的阿姨拖着长长的上海腔叫：“王小慧——听电话！”我从窄窄的木楼梯冲下楼，跑到马路对面的电话亭，心想大概又有朋友来道别了。没想到电话中传来一个冷冷的声音——系党总支的工作人员请我们到学校谈话。

“怎么来得及？乘公共汽车往返可能会拖上三四个小时，我们的飞机会误点的……”

“你们先不要考虑出国的事了。”又是那么冷冷的像机器里发出的声音，似乎没有性别。

“为什么？”

“你们来了再说吧。”电话挂上了，那嘟嘟的声音使我一片茫然。

在去同济大学的路上，我感到手心发冷，似乎后背也透着凉气。我百思不得其解，是什么原因使这早就确定的事在最后一刻被全盘推翻，听去没有一丝希望？那中性的声音说得那么肯定，不至于是我们结婚的事被人告发了？那时是不太可能让夫妻俩一起出国的。

向来沉默寡言的俞霖，一路上没说一句话，只是紧紧抓住我的一只手，双眼看着窗外。公共汽车开过当时并不那么繁华的延安路、四

作为唯一的中国人，这张“试图带走珍贵的东西”（1990年）被收入在英、美、德出版的摄影史书《150年大师摄影作品集》。（我用烛光象征那些有形和无形的“珍贵的东西”，你无法将它带走……）





同学们戏称我们是一对“金童玉女”

平路,自行车夹在缓缓行驶的汽车之间,重复着每天千篇一律的都市一幕,但这个城市的一切似乎都与 we 无关。那时我还不太懂得命运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只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种不可抗拒的东西在左右着你,个体是那么渺小,我不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

汽车仍在极缓慢地向前蹭着。我心里像猫抓一样,有种不祥的预感。想到一本小说中描写“文化大革命”中类似的情形,一种莫名的恐惧一下子笼罩了我。爸爸在“文化大革命”时试图自杀的情景历历在目。那时我幼小的心灵常常被这种恐惧所笼罩,每天晚上不论天有多冷都站在阳台上等爸爸回家,超过正常时间太久时,我总会设想出各种可能发生的可怕的事情……

我对俞霖轻声说:“我觉得又在搞‘文化大革命’了。”他安慰我说:“不会那么糟,我们没做任何错事。”

我们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建筑系的大楼。

没有解释,没有安慰,更没有一丝略带人情味的表示。我们各拿一叠纸,分别到不同的房间,要写出这两年的经济收入情况。对我这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特别是对经济收入这类事既不关心更无兴趣的人,无疑是比所有出国考试都难得多的题目。我眼睁睁地看着那叠纸不知如何下笔。而看着手表的指针,正走向我们去机场的时间……

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查我们的经济账?我们只不过是刚刚毕业留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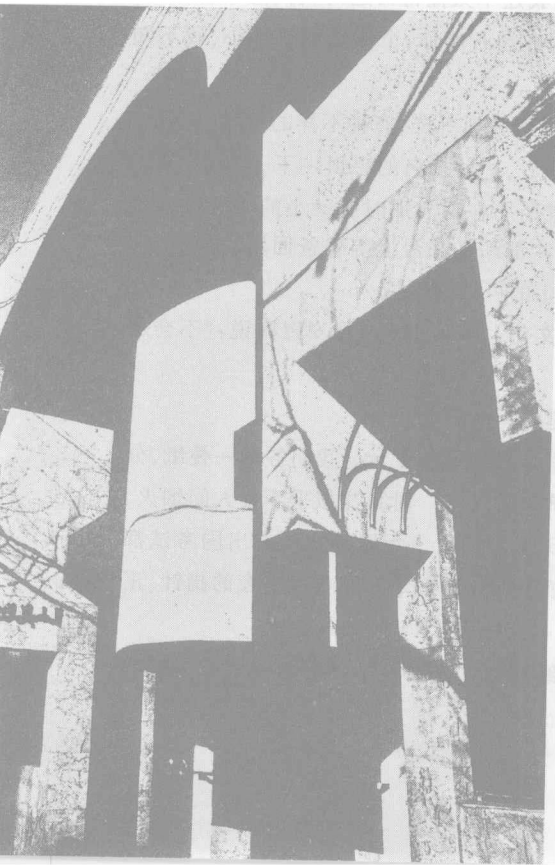
青年教师,拿着几十元的工资,除了做过上海清真饭店的改建工程外,并没有什么额外收入。这设计因为构思新颖,颇受好评。我们让来采访的记者在报导中不要提设计者姓名,只说同济大学教师的作品,生怕临出国前有人找麻烦,节外生枝。而这工程的设计费,我们根本没拿到什么。因为从来不好意思过问钱的事,但作为刚毕业的学生,很希望亲眼看到自己的作品能赶在出国前建造起来,因此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那个工程上,也没有精力考虑其他。

我知道在同学同事中想要出国的人太多了。而那时公费出国的名额如九牛一毛。我和俞霖同时拿到公费奖学金自然是遭嫉妒的事情。虽然我自认为我们人缘很好,可在那些日子里一下子感到了世态炎凉,许多熟悉的面孔变得陌生。在食堂这样的地方人多,他们还可装作没看见,而在办公室走廊上迎面走过,相识的人竟然不敢打个招呼,甚至不敢抬头看你一眼,好像我们患有可怕的传染病。这使我十分伤心,甚至比出不了国这件事本身还让我心灰意冷。我当时想,即使出不了国,也不要再在这里继续工作了。整整一个月时间,我好像一下子成熟多了,甚至觉得自己老了。

我对一个刚退休的老教授说出觉得自己老了的感觉,他说他已经60多岁,都没有老的感觉,相反开始做些想做的事情,并安慰我他经历了比我难得多的遭遇,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那时我会为一个关切的目光感动得流眼泪,而且暗暗发誓记住这些真心对我好的人,哪怕他们不敢在公开场合与我说话。

正在这时,我收到了被我们称作老大哥的同学郑孝正的来信,他一直是我最信赖的有如兄长般的朋友。当我在追求者中挑花了眼,征求

当年坐落在上海市中心福州路西藏路口(现为莱福士广场)的上海清真饭店,是俞霖和我建筑师生涯的处女作。可惜现在因老城区改建已被夷为平地,建筑早已荡然无存。





在长城的另一端——嘉峪关,我们碰到了沙漠中罕见的雨。雨后我在漫天彩霞和夕阳下拍下了我与俞霖投在地上长长的影子,从此我们也是“西出阳关无故人了”。

他意见时,他毫不犹豫地说:“当然俞霖最好。”他的话似乎一下子把我的情感定了形。这时,老大哥已飞到德国。他的信是在机场匆匆写了发来。他说:“我坚信你们是无辜的,也相信很快会在德国看到你们……。”这些话让人感到那么温暖。

在1986年10月6日的日记中我写了这样的一段话作为座右铭:“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所谓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我觉得我们虽然遭受挫折,但没有被打败,我们的人格反而受到了一次锤炼。晚上我常会与俞霖去看电影。我们一直非常喜欢看电影,以前却总没时间看。

后来,我才知道有人写了匿名信,而且确实有些设计费被中间人扣住,我们一直蒙在鼓里。我这个人太单纯,太不懂人情世故,所以有时会被别人的笑脸和一些表面的东西所欺骗。俞霖对我说,如果这是缺点的话,他正是喜欢我的缺点,如果我过于精明,“那就不是我的小姐姐了”。

几经调查,这事总算了结。但新的问题是我们结婚的事已经公开,按照规定,夫妻不可以一起出国。又是连续几天的开会讨论,无休无止。至今我还是感激那些领导和决策人,以及同情帮助我们的人们。据说许多被征求意见的教授都说,他们无法说出我和俞霖哪一个更优秀。如果只能让一个人出国,他们觉得实在太可惜。这使我们得以破例双双出国。特别是在那整整一个月的压抑之



同样具有象征意味的是初到欧洲时在意大利阿尔巴岛上拍的这张照片。原照是彩色的,透过厚重的石墙洞是那广阔的蔚蓝色的海与天。虽然海平线遥远而朦胧,但你终于能看到它。这就是我们出国前心情的写照。

后,再次踏上旅途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

我们分别去不同的城市,我是去南德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他则是前往北德靠近汉堡的大学城布伦瑞克。我们一起先飞到法兰克福再分别转机。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我想起一个诗人朋友临别时对我们说的一段话:“飞机在跑道上加速时,地面的摩擦力非常之大,要有足够的能量来克服这些阻力。一旦离开地面,空气的阻力与这摩擦力相比微不足道,飞机就可以自由飞翔了。最难的是在起飞之前那一段。”他用这段话送我们启程,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当天把它写到日记里,事后多少年,我乘飞机时,常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这段富有哲理的话。

终于可以长长舒一口气了。我把头靠在椅背上,轻轻拉着俞霖的手说:“我们可以飞了。”他仍像往常那样,默默地对我报以平和的微笑。

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到了法兰克福机场,走下飞机,对我们这样初次出国的年轻人来说,一切都显得那么新鲜和令人惊讶。整个机场像个巨大的机器,有条不紊地运转着。我们要分手了,虽然我转机需要等待的时间比他的要长,他还是执意先把我送到去慕尼黑的登机口,像过去放假送我上火车回家探亲时一样,总是放不下心来。在自动传送带上,他那么开心地笑着,说他在飞机上便会开始给我写信。他渐渐远去,只看到他一直在挥手……

我们那时还没有电话,只有地址。我们约定互相写信。最晚在圣诞节放假时